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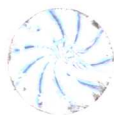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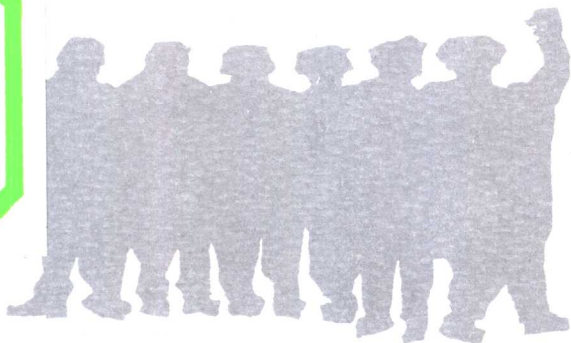
冷战年代的中国与世界 

[挪威] 文安利 / 著

陈之宏 陈 兼 / 译

冷战与革命


——苏美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革命年代的中国与世界

冷战年代的中国与世界 

[挪威] 文安立 / 著

·陈之宏 陈 兼 / 译

冷战与革命

——苏美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Cold War and Revolution: 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in a Chinese
Translation Licensed by Odd Arne Westad
桂图登字: 20·2002-08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冷战与革命——苏美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 / [挪] 文
安立著; 陈之宏, 陈兼译.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 2002. 10

(冷战年代的中国与世界)

ISBN 7-5633-3495-5

I. 冷… II. ①文… ②陈… ③陈… III. 国内战
争—史料—中国—1919~1949 IV. K2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889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 541100)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cn>

出版人: 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89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8.5 字数: 253 千字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3 000 定价: 17.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原籍挪威,现任伦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史教授。他于1989年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获博士学位,曾担任挪威诺贝尔研究所研究部主任。他是近十余年间在国际学术界冷战史研究中涌现出的最负盛名的中青年学者之一。本书是他的主要代表作之一。

译者简介

陈之宏在德国科隆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任教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亚洲及中东语言文化系。

陈兼现任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中美关系研究讲座教授及历史系教授。

冷战国际史研究及其他

——“冷战年代的中国与世界”丛书总序

“冷战”作为世界现代历史上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阶段^①,已经结束了。正是因为20世纪中叶出现的世界两大阵营相互对抗已经成为历史,人们才有可能在冷战格局已不复存在的条件下,回过头来对于冷战的起源、美苏冲突的演变过程、中苏结盟和走向分裂的原因、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内部结构、冷战对苏联解体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比较客观的重新思考。于是,从90年代初,国际学术界关于冷战及其历史的研究和讨论掀起了新的热潮。^②在参与学者的人数和国度、研究的角度和方法、题目的和类和范围以及档案资料所涉及的语种和国家等方面,都大大超过了以往几十年的研究状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在西方学界把冷战史称为冷战国际史。^③

^① 对于冷战的概念,人们有不同的理解,因而对冷战发生的年代也有各种说法。有的认为冷战发生在战后美苏对抗开始的年代,有的认为发生在战时后期苏联与西方盟国之间出现矛盾和裂痕的时候,还有的认为早在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冷战时代就开始了。不过,一般说来,第一种看法为多数人所接受。尽管在导致冷战爆发的具体时间和事件上尚有分歧,但冷战的特定意义在于以美苏两国为中心的世界两大集团的形成并处于对抗状态则是共识。

^② 有人统计,目前在国际互联网上,仅 yahoo 一个网站中即有“冷战”网址 91 个,而有关冷战的网页则达 11.7 万之多。

^③ 我在美国进行学术访问时,曾与那里的学者讨论了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这一概念的含义,故有此说法。

80年代以前,东方^①各国,包括中国学者,对冷战历史的研究还十分薄弱。他们大多没有加入国际学界这一领域的研究行列,即使有所涉猎,主要也是资料性和介绍性的论著。^②那时的冷战史研究似乎只是西方学者的专业特权,其研究的主体和中心则在美国。这不仅体现为研究所依据的史料主要来自美国档案,而且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也是以美国在各个时期的相关政策及其得失为主。于是,美国学者在冷战研究中便自然处于明显的世界领先地位,他们的论著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而且形成了不同学派。^③

在冷战结束后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作为冷战一方的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其中特别是以前作为冷战主角之一的俄国,开始大量解密和公布以往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这成为20世纪末历史学界和档案学界的一件具有历史意义和轰动效应的大事。^④由于过去苏联和其他东方国家的历史资料处于封闭的状态,人们对于冷战历史中诸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往往是片面的、迷惑的、不确定的,甚至是错误的。只有在这些历史档案大量解密并陆续公布于世的情况下,人们才有可能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比较全面的重新认识。而这一状况从根本上改变了冷战史研究集中体现在冷战一方——西方学术领域的现象。由于可用档案和史料范围的扩大,导致了相应的结果:其一,这些新档案文献来源地——俄国、中国以及原东欧国家的学者纷纷加入了冷战史研究序列。不仅他们本身参与国际学术会议,与西方学者直接对话,而且他们的论著也不断得到评介、引用,并被译成其他文

^① 这里使用的是广义上的东方概念,包括了东欧、苏联和亚洲地区。

^② 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上海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刘舜教授主编的大型资料性著作《战后世界历史长编》,该书自1975年出版第1卷,至今已有9卷,按专题介绍了西方有关冷战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史料,可以称为中国冷战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③ 在冷战激化的年代,占主流地位的是传统学派;美国反战高潮时期,产生了修正学派;到缓和呼声响彻世界时,后修正学派又应运而生。这本身也说明了当时美国在冷战研究领域中的中心地位。

^④ 关于俄国档案解密及其利用的情况,参见沈志华《俄国档案文献:保管、解密和利用》,载《历史研究》,1998(5)。

字,引入世界论坛;^①其二,研究领域大为拓宽,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角度也越来越多样化。研究者有机会接触到俄国、中国和东欧各国的档案文献,因而就有必要和可能从冷战的角度,即战后世界格局划分的特点来重新思考和评价这些国家当时的发展模式和外交思路,或者从国际的角度,即一种能反映苏联、中国、东欧以及西方的观点来重新思考和评价冷战的起源及其历史进程。^②

当然,冷战史研究国际化的趋势并不是自然和自发产生的,它离不开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不过,在这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当首推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于1991年设立的冷战国际史项目(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1992年7月,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中心、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与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签订了一项合作协议。该协议的特点是通过由威尔逊中心出资组织专题学术讨论会的形式,向会议和与会学者提供有关题目的俄国档案材料。作为该协议的执行人,冷战国际史项目与各国研究机构合作,连续组织了若干次高水平的国际学术讨论会。^③在这些会议上,各国学者不仅发表了许多优秀学术论文,展开了深入讨论和交流,而且从不同国度和角度提供了大量有关冷战各种专题的最新档案文献。冷战国际史项目还每年出版一期学术刊物——《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CWIHP Bulletin*),免费寄送给需要这些材料的各国学者。^④该刊物的最大特点是:一

① 尽管没有统计,但近年来,在美国历史研究刊物上以英文发表的俄国、中国和东欧各国学者关于冷战的论著和有关资料,显然是空前的,甚至在西方单独或与西方学者合作发表专著的也不乏其人。

② 美国冷战史研究大家、耶鲁大学历史教授约翰·盖迪斯1997年出版的那本专著的书名——*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以及他在序言中对此书名的解释,特别能说明这一现象。

③ 这包括:1993年1月的莫斯科会议(“冷战会议”,与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合作),1995年7月的华盛顿会议(“朝鲜战争历史”),1996年1月的香港会议(“冷战在亚洲”,与香港大学合作),1997年10月的北京会议(“冷战与中苏关系”,与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和当代中国研究所合作),1998年6月的奥斯陆会议(“关于冷战历史的档案文献”,与挪威诺贝尔研究所合作),等等。

④ 该刊物已经进入国际互联网,网站:yahoo,网址:<http://cwi hp. si. edu>。

方面发表各国学者对于冷战研究的新成果,一方面刊载大量译成英文的中国、俄国和前东欧国家关于冷战的档案文献,从而大大促进了各国学者之间的交流,方便了各国学者对不同语种档案文献的利用。此外,冷战国际史项目还提供资金,每年组织一批中国、俄国和前东欧国家学者前往华盛顿作数月的访问研究。^①该项目不仅为他们创造了优越的研究条件,而且毫无保留地向他们提供各国档案的复印件。^②这些做法对于推动冷战国际史研究向纵深发展,在互补和交流中提高各国学者的研究水平,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冷战史研究之所以在冷战结束后出现如此繁荣局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看到,冷战思维(例如对抗)和冷战策略(例如遏制),并没有随着具有特定意义的冷战时期的结束而结束。产生冷战现象的条件还存在,产生冷战思维的基础还存在,那么,是否还会出现新的冷战?对抗双方的主角会是谁?一旦出现新的冷战将把人类社会引向何方?这是萦绕在政治家和学者头脑中挥之不去的疑虑和担心。于是,人们需要历史,需要研究历史上究竟是哪些因素的合成造成了人类对峙的冷战局面,究竟是哪些力量的聚合使得人类曾经走到了自我毁灭的边缘。特别是面对21世纪的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人们力求历史给予答案,以避免人类社会曾经经历过的愚蠢行为,避免那些可能给自身带来灾难的不理智和不明智的举动,使21世纪真正成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世纪。

中国的冷战史研究才刚刚起步。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中国学者在冷战历史的某些领域是颇有建树的。例如关于中美关系、美国对华政策、中苏同盟的起源、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形成以及朝鲜战争的研究,已经达到了可以在国际论坛上与各国学者对话的水平。这就构成了我们把冷战国际史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发展起来的良好基础。然而,也正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基础还显得十分薄弱。

^① 据我所知,自1993年起在冷战国际史项目作访问的中国学者有牛大勇、陈晓鲁、郑永平、张小明、任东来、李丹慧等人。

^② 我和李丹慧仅1998年12月至1999年2月在那里工作期间,即复印了7纸箱约万余页美国、俄国及一些东欧国家的档案材料。

首先,对于冷战史研究的许多方面,我们还涉足不深或刚刚开始探索。例如,伊朗事件、土耳其危机、马歇尔计划、柏林危机、共产党情报局、苏南冲突、核武器的发展与军备竞赛、华约与北约的对抗、苏联与东欧各国的关系、匈牙利事件、加勒比海危机、柏林墙危机、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战争,如此等等。而所有这些都与冷战发展密切相关的事件,都是目前国际史学界十分关注的课题,而且有关这些历史事件的档案文献也已经陆续公布出来。至于有些领域,我们则根本没有涉及。例如,冷战与经济的关系:如何使用经济手段进行冷战,或反过来,冷战如何影响了经济发展道路。^①在这些尚未开垦的处女地上,我们必定是大有作为的。

其次,我们较少从中国的角度来考察和评价冷战的历史,或者从冷战的角度来研究和解释中国的历史。中国在冷战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中国的政策如何影响了冷战,冷战又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发展?如果我们把中国当代对外关系史的研究纳入冷战的框架进行考察,例如中国对美政策的演变、中苏关系的恶化、台海危机及对台政策、中印边界冲突、中国与越南的战争、中国与东欧国家的关系以及中国与第三世界的交往,等等,特别是充分使用中国的档案文献,那么,我们无疑将对冷战国际史研究做出独到的贡献。

还有,目前中国对冷战历史的研究还处于单兵作战的状态,没有形成系统和规模,学者之间也缺乏交流和互补。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就需要我们组织起来,加强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为此,北京大学历史系与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联合建立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现代史料与研究中心,希望通过这样的学术机构,组织专题讨论会,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同时,收集和介绍各国有关冷战历史的档案文献,并在条件成熟时设立专业史料保管和利用机构,并以此联络各方面从事冷战史研究的学者,把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推上一个新台阶。

^① 不过应当指出,在这方面,西方的研究也刚刚开始。直到1997年美国才出现了第一部专门讲述经济在冷战中的作用的专著,即 Diane Kunz 的 *Butter & Guns: American Cold War Economic Diplomacy*。

这些也正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现代史料与研究中心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共同发起和组织出版这套“冷战年代的中国与世界”系列论著的宗旨和出发点。本系列采取自由投稿方式,纳入系列的著作形式不限,可以是专著,也可以是译著,可以是论文集,也可以是文献资料集。但无论何种形式,必须保证以足够的历史档案文献作为论著的基础,因为利用第一手史料从事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条件,目前在中国已经开始出现,^①而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与国际学术界展开对话,才能把我国的世界现代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最后应该指出,虽然冷战国际史研究正在成为中国和世界历史论坛中的热点,并且逐步引起世人的关注,但以后的道路很可能是艰难的和漫长的。所谓艰难,是说人们——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要摆脱以意识形态对立为基点的冷战思维,要摒弃以武力威胁为行动准则的冷战策略,要真正树立以维持世界和平为己任的新观念,必然会有一个对以往教训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所谓漫长,是说新的档案材料——特别是东方国家的档案文献——还需要不断挖掘,更要求使档案文献的保管、解密和使用逐步走向科学化、正规化和制度化。而新史料的不断涌现,就迫使学者不断地对历史进行重新认识和表述。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耐心细致地对他们所得到的以及还没有得到的文献资料进行考证、探寻、对比、分析,人们才有可能获得一幅相对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在这个意义上,爱德华·卡尔的一句名言特别值得回味:“历史是历史学家与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②

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 沈志华

1999年4月30日

^① 近年来,不仅中国的有关档案文献相继出版,美国的冷战史料不断引入中国,而且大量译成中文的俄国历史档案也即将与学者见面。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九五”重点科研项目、国家“九五”规划重点图书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拟于今年开始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陆续分卷出版。这套总计30卷、1500万字的大型文献集预计2001年出齐。

^② 爱德华·卡尔《历史是什么?》,中文版,28页,商务印书馆,1961。

中译本序言

为本书写序言,令我至为愉快。我撰写这一序言时有着三个主要想法:第一,试图将这部于1993年在美国出版的著作中得出的结论与进入1990年以来中国年轻一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联系起来。第二,试图将那些在撰写本书时尚未公开的前苏联的秘密档案资料与本书的有关分析进行比较,看看它们是否大体相符。第三,试图将本书的分析论述同我目前正在撰写的一部有关1946-1949年中国内战的著作所涉及的问题结合起来加以讨论。^①

对于研究中国对外关系史的学者们来说,一个真正令人感到欣慰的现象是,进入1990年以后,中国在这一领域涌现了许多杰出的历史学家。在海峡两岸,年轻一代的学者们正利用越来越多接触档案资料的机会以及日益宽松的政治环境,对过去半个世纪里中国与世界各大国之间的关系进行新的探讨。他们所取得的进展使人惊叹不已。直到80年代初期,中国学者还只有在短期或长期出国时才能从事严肃的历史研究,而在国内,他们的才能往往会受到政治环境的限制,因而难以产生富有批判精神的学术成果。而今,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中国对外关系史这一领域里,许多最有意义的学术讨论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展开。

至于本书所讨论的中心问题,即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以及美国与苏联这两个世界大国在二次大战结束阶段及中国内战开始时期的相互关系,

^① 自从1992年以来,我十分详细地查阅了莫斯科的苏联外交部档案和前苏共中央委员会档案,受益匪浅。为此,我要向这些档案馆的负责人及工作人员致谢。

也由于上述学术发展而具有了全新的特点。以往,在官方路线影响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们通常持有的论点是:美国一以贯之地奉行反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政策,苏联则至多只是对中国的事态发展抱一种袖手旁观的态度。中国内战之所以爆发,其主要原因在于蒋介石得到了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因而拒绝进行谈判并公然对中共发起进攻。今天,年轻一代中国学者的看法已同本书所阐发的观点十分接近。他们所强调的是,中国内战的发生原因既在于美国在对外政策上犹豫不定,也在于苏联所起的重要所用,同时,国共两党也都在不同程度与意义上负有某种责任。^①

为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以上这些问题,学者们对于毛泽东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进行了极富批判性的研究,而这对于理解中国政治在40年代的发展颇有助益。年轻一代中国历史学家更倾向于强调毛泽东在中共内外政策的制订中所起的中心作用(甚至超过了本书对此所作的强调)。早在40年代中期,中共上层的所有决策便已经围绕着毛泽东展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那些对其他国家或今日中国的决策进程习以为常的人们所难以理解的。根据我对中国历史学家们所提供的新证据的解读,至少可以说,毛泽东在二次大战结束后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并没有一种固定不变的看法。一方面,他本人从策略出发的考虑以及来自苏联人的劝告都告诉他,如果和平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得到维护,将是对中共有利的。但另一方面,他那种急于推动革命的意念以及意识形态上的信仰却又使他认定,40年代中期是向国民党开战的有利时期。1946年早春,周恩来仍在为通过谈判让共产党人作出最小让步的情况下找到避免内战的方案而努

^① 在这批新的中英文著作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杨奎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年》,重庆出版社,1993;章百家《周恩来——中国外交的缔造者和奠基人》(Zhou Enlai——The Shaper and Founder of China's Diplomacy),载韩德(Michael H. Hunt)和牛军编《二十至六十年代中共外交史的特点及阐释方法》(*Toward a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Relations, 1920s - 1960s: Personalities and Interpretative Approaches*),威尔逊中心(华盛顿),1995。

力,但此时毛泽东却已对此失去信心。中共在东北采取军事行动的做法实际上促成了中国内战的全面爆发。^①

中国学者新的研究成果也对我们理解中共与苏联之间的关系有很大的帮助。正如杰出的中国历史学家杨奎松在其新作中所指出的那样,要把握中共同苏联的关系在40年代中期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就必须搞清楚这一关系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与苏共模式的指导下,以苏共为榜样而建立起来的。在关于中共与苏联从20年代到40年代的20年间实际上有过怎样的合作关系这一问题上,我们看到过各种各样的资料记载。然而,有一点却是明确的,那就是,当二次大战结束时,苏联与斯大林这两颗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还是年轻人时便已在中国共产党人心中无比辉煌的明星,依然像过去一样光彩夺目。苏联代表着希望与未来,苏联的模式是中国的榜样。^②

我在本序言的以下部分将对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作更为详尽的讨论。但我首先想做的是,正如本书在论及1945年秋天的历史发展时通过文献资料所证明的那样,我也将向一些见地不及此的人证明,尽管在中共与苏联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高度一致,但它们之间同时也有着大量的矛盾冲突。毛泽东也和其他国家的大多数革命领袖一样,遵从斯大林的领导并不意味着他会服从斯大林的命令而采取对中国革命造成致命损害的行动。同那些将中国共产党人视为苏联“工具”的看法相反,在我看来,对某一理想与目标的信仰同一般理性并不相互排斥。

由资中筠这样的先行者所开创的对于美国对外政策历史的严肃研究,帮助中国大陆学者认识到,美国政府在二次大战结束时还不是中共冥顽不灵的敌人,其对华政策则基本上处于踌躇不定的状态之中。1945—1946年间,美国政策的基本趋势既日益表现出与苏联对抗的意愿,又带有希望使内战避免在中国发生的理想色彩。正如牛军和章百家所指出的,当马歇尔在华使命的成功希望尚未完全破灭之时,影响美国政策的这两种

^① 关于对较早的中文著作的评论,见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

^② 参见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

因素一直相当和谐地混合在一起。但是,当调停终于失败时(而马歇尔本人作为主要调停者在这一进程中绝非无懈可击),华盛顿最终开始对中国内战奉行一种向蒋介石提供有限援助的政策。尽管这种政策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没有让任何人感到满意,但从美国政府内部的角度来看,这却被认为是一种明智与审慎的政策选择。^①

要撰写中国内战的历史,就必须将国民党也包括进来。有关这方面新的研究资料表明,本书的一些基本假设是站得住脚的。现在,我们已可以肯定地说,当抗日战争一结束,蒋介石便决定要对中共采取军事行动。但是,一系列的国内外力量却又在维护和平的问题上形成了对他的制约。根据从国共两方面所披露的新材料来看,如果蒋介石所发动的军事攻势不是为马歇尔使命所打断的话,他本来是有可能在军事上取得更大的优势地位的。但是,蒋介石未能利用短暂的和平时期来加强自己的政权,中共却使得这一时期朝着有利于自己革命的方向发展,对此主要仍应从蒋介石政权存在的种种内在弱点来加以解释。

我同一些中国学者仍在某些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例如,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由于美国的态度绝非不偏不倚,马歇尔使命在避免中国内战的问题上注定将无所作为。虽然我同意华盛顿并不是一个不偏不倚的调停者,但我并不认为我们已对马歇尔使命究竟有多大的成功机会这一问题有了确定的答案。如果杜鲁门总统在1946年春末夏初表现出撤回美国对蒋介石政权支持的意愿的话,那么,和平也许还会有一线希望。说到底,尽管中共与苏联在东北的行动确实起到了促成内战全面爆发的作用,但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斯大林其实都并不希望看到内战的发生。

我还认为,苏联对中共的影响要比大多数中国学者所认识到的要大得多。正如本文以下将要揭示的,斯大林对中共来说是一个起着关键性作用的决策者,中共所有的重要决定都是在同苏联人磋商后才做出的。同我有机会利用俄国档案前的看法相比较,我还认识到,中共领导人确实很把

^①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章百家《周恩来——中国外交的缔造者和奠基人》。

自己同莫斯科之间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信仰当成一回事,而我以前对这一点的认识是不足的。

最后,我不能不让那些在中国从事研究工作,但却未对40年代中共领导层内部的意见分歧给予充分重视的学者们感到失望。虽然毛泽东是中共的核心领袖,但中共主要领导人却在很多问题上(包括在对外政策问题上)持有不同看法。例如,彭真和林彪在对党在东北对苏联政策的问题上就有不同意见。任弼时(某种意义上也包括刘少奇)则在中国革命发展模式的问题上与毛泽东的看法有所不同——他们比毛泽东更倾向于模仿苏联的经验。党内的这些争论在当时就有着重要的意义,对党的历史发展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因此,这些问题需要得到更为深入、更具批判性的探讨,而我们迄今为止在这方面做得还是很不够的。

那么,从以前属于最高机密、近年来才开放的俄国档案所提供的新证据中,我们是否对本书所探讨的问题有了更多与更深入的了解?我所读到的新近开放的俄方资料证实,二次大战结束时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政策不仅目标不明,还带有即兴发挥的色彩。斯大林在确定对华政策的问题上遇到了困难。正如我在本书中所阐述的,他的主要的策略目标是要阻止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与美国直接结盟。而我们在俄国档案开放前所不知道的是,当他对蒋介石实行那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时,他其实真诚地希望这一政策能使得国民党领导人就范。而当这一政策未能生效时,斯大林实际上是非常吃惊的。

斯大林相信苏联有必要也有可能同国民党建立联盟关系。他的这种信念是以他对中国革命阶段性的认识以及对国民党政治特点的分析为基础的。斯大林直到去世时仍然相信,中国仍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这将在中国产生一个民族民主政权。直到中国1948年的军事形势发展改变了他的看法为止,他一直认为,从历史意识的层面来说,最适于领导这一阶段革命的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如果苏联要想阻止美国势力渗入中国,它就必须同国民党打交道。国民党由于本身的特点,从长远来看是有可能被吸引到苏联这一边来的,而不会被任何帝国主义大国吸引

过去,成为它们控制中国的工具。^①

斯大林还坚持认为,只要美国仍然深深卷入中国的内部事务,中国革命的完成(即由一个由中共主导的政府逐步取代国民党政府),便是不可能的。正如斯大林反复向毛泽东解释的那样,中共要想有未来,就必须迫使美国人撤离中国。而在斯大林看来,要使这一点成为现实,中共就必须同国民党联合起来,建立反帝的统一战线。^②

斯大林及其助手们从来便相信,社会主义(以及中国共产党)将最终在中国取得胜利。但在这一胜利何时才会到来的问题上,他们同中共领导人的看法简直大相径庭。关于斯大林的新文件的引人注目之处便在于,它们表明,苏联领导人在一个长时期里坚持认为,国民党应当在中国大陆发挥某种领导作用,甚至当国民党的军事失败已变得极为明显时仍然抱有这种看法。从上述意义上来说,意识形态所起的作用至少比我在未看到这些苏联文件前的想像要大一些。

我目前正在撰写一本全面论述 1946 - 1950 年中国内战历史的专著(我希望这将是一本简明的专著)。有鉴于此,在结束这一序言时,我将对一些既同本书所探讨的时期相关联,也同这之后的时期有联系的问题作进一步的反思:就对内战结局所产生的影响而言,在 1944 - 1946 年间的各种事态发展中,哪些具有真正的意义?

首先,我仍然认为,国际事务对于中国内战的结果所起的作用比大多数中外学者所认识到的都大得多。苏联从东北的匆匆撤军以及它在撤军过程中对中共所提供的战术及军事支持,是全面内战于 1946 年年中爆发的主要原因。中共与苏联在 1946 - 1949 年间所保持的紧密关系,则是阻止任何西方大国对中国进行干预的、有效的遏制因素。苏联的意见还在中

^① 关于斯大林的态度,见文安立(Odd Arne Westad)编《战友:中苏同盟的兴衰,1945 - 1963》(*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 - Soviet Alliance, 1945 - 1963*),威尔逊中心出版社,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8。该书收集了许多杰出的中国学者(如杨奎松、陈兼、张曙光和牛军)的文章。

^② 莫斯科的档案馆正在逐步开放斯大林给毛泽东的密电。想查寻这些材料的英文件的学者可以翻阅威尔逊中心出版的《国际冷战史研究公报》(*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Bulletin*),或通过国际互联网访问它的主页:<http://cwihp.si.edu>。

共制订接管城市以及建立一个由党所领导的新国家的计划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①

就国民党而言,美国援助所起到的作用具有两重性。在马歇尔使华的第一阶段,由于美国人的存在,国民党很难对中共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后来,美国的经济援助虽然使得蒋介石政权能够在某种限度内运转下去,但在我看来,也阻碍了国民党的内部变革——而国民党政权若要在中国大陆长期生存下去,就必须依赖于这种变革。国民党中国经济结构的崩溃很容易地便被美国的经济援助掩盖起来了。

国际事务是否也对中国内战的结局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回答很可能是否定的。我仍然认为,决定中国内战最终结局的是两大国内因素的结合。第一大因素,是中共在城市与乡村地区推行的政策所具有的灵活性与确定性。虽然中共曾经犯过诸如土改早期那样的“左倾”错误,而这些错误也曾使得中共有可能失去内战的胜利,但党的领导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从失败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并调整自己的政治理论,使之适应于中国的土壤。另一个主要因素是国统区所面临的危机。这一危机起源于中日战争,并由于国民党在1945-1946年间所作出的一系列拙劣的政治与经济决策而进一步恶化。结果,普通中国人越是受到国民党政策的后果之害,便越是宁愿接受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即便这本来也许并不是他们的政治选择。

战争是使得这两个主要因素得以产生结果的工具。为了对这一时期有一个全面的理解,我们必须花费更多的精力,对中国内战中的战略并对40年代中期与晚期中国内战中为人们所料到的和未曾料到的各种结果重新加以探讨。虽然本书论及了军事问题对于外交与政治结局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我并未很好地涉及大小战役以及军事部署所产生的具体效果的问题。希望中国的历史学家们能够将中国内战历史的这一局部以及其他方面的研究推向前进。

最后,我谨在此对好友陈兼教授为本书中文版的出版所作出的巨大

^① 韩德《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起源》(*The Genesi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纽约),1996。这是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共外交的最重要的一部著作。